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母亲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周春燕^{1,2},叶天^{1,2},黄海^{1,2},李林^{1,2},宋静静^{1,2},刘陈陵^{1,2} (1.中国地质大学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用心理研究所,武汉 430074)

【摘要】 目的:探讨工作母亲的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育儿压力和配偶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中部某省四个城市的467名工作母亲进行测量。结果:①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育儿压力在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②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受配偶支持的调节,调节作用体现在配偶支持缓冲了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不良影响。结论:家庭-工作冲突通过增加育儿压力降低婚姻满意度,而配偶支持能在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关键词】 工作母亲; 家庭-工作冲突; 育儿压力; 配偶支持; 婚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5.035

Effect of Family-Work Conflict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to Working Mother

ZHOU Chun-yan^{1,2}, YE Tian^{1,2}, HUANG Hai^{1,2}, LI Lin^{1,2}, SONG Jing-jing^{1,2}, LIU Chen-lin^{1,2}

¹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²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work conflict, parental pressure, spousal support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working mother. Methods: 467 working mothers were surveyed in four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Results: ①Family—work conflic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ly predictive effect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arenting pressure mediates family—work conflict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②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work conflict is mediated by the spousal suppor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spouse's support to the family—work conflict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Family—work conflict may reduce marital satisfaction by increasing parenting pressure. The effect of family—work conflict to marital satisfac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spousal support.

[Key words] Working mother; Family-work conflict; Parental pressure; Spousal support; Marital satisfaction

家庭-工作冲突(Family-work conflict)是工作-家庭冲突的一个维度,指家庭需要与工作需要出现 难以协调的矛盾时产生的角色冲突回。这种角色冲 突涉及家庭与工作两个领域,与每个职业工作者息 息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就业人数不断攀升, 2013年国内女性就业人数已达34640万,占就业总 人口的45%,是劳动力市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2]。然而,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较大,但女性 担任中高层管理者的比例仍低于男性,仅2.2%的在 业女性担任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负责人,是男性 所占比例的二分之一。此外,高层人才单位中,男性 担任第一负责人的比例为80.5%,远高于女性[3]。由 此可见,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 位。特别是全职工作的母亲,身兼职业工作者与一 个或多个未成年孩子母亲的双重身份,面临着更大 的角色冲突。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 示,孩子6岁以下的25-34岁城镇母亲在业率为 72%,农村母亲为79.7%[3]。工作母亲在完成工作任

【基金项目】 本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06415033)

务的同时,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调查显示,女性做家务、照料孩子的比例在72%以上,而男性的比例仅在16%以下^[3]。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工作母亲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二胎的降生使其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幼儿,同时又需要谋求职业发展,为家庭获得稳定的经济支持。此时,若配偶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那么工作母亲的角色冲突势必会加剧,进而对其婚姻关系造成不利影响。研究发现,"金领"女性的离婚率高于其他女性,居于榜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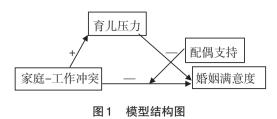
婚姻满意度(Marital Satisfaction)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是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5]。在众多预测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中,与家庭、工作相关的角色冲突是预测职业女性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之一。关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可大致分为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加强假说(Enhancement Hypothesis)认为各种角色间可以相互促进,个体担任多种角色时的获益可能会大于投入损耗^[6]。稀缺假说(Scarcity Hypothesis)则认为家庭、工

作需求会争夺个体有限的资源,进而导致家庭工作间的冲突^[7]。匹配假设(Matching-Hypothesis)进一步阐明,当结果变量与冲突源处于同一领域时,家庭与工作间的角色冲突将造成更大的影响^[8]。也就是说,家庭-工作冲突与那些家庭领域的变量如婚姻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等有更强的关联。已有研究证实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郑颖娴等人调查了228对新婚夫妻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发现家庭-工作冲突得分越高,婚姻满意度得分越低^[9]。

育儿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婚姻满 意度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Lavee 等人调查了287 对育有子女夫妻的婚姻质量,发现夫妻双方的婚姻 质量受到育儿压力的负向影响[10]。Krieg对女性分 娩前后的调查同样发现,产后的女性认为婚姻质量 的积极方面,随时间推移下降回。同时,家庭与工作 间的角色冲突与育儿压力也存在密切关系。一项以 消防员父亲为样本的调查四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 育儿压力间存在正相关。此外,不少研究表明,养育 子女与工作-家庭冲突存在相关[13,14]。综上可见,现 有研究大多探讨工作-家庭冲突与育儿压力的关 系,较少从家庭-工作冲突对育儿压力的影响着 手。基于匹配假设,育儿压力作为与家庭相关的结 果变量,受到家庭-工作冲突影响的可能更大。实 际上,家庭-工作冲突水平高的女性,容易体验到更 大的育儿压力, 若此时得不到配偶的支持, 会使她们 对婚姻感到失望。

配偶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指个体得到配偶支持的程度[15]。在关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与婚姻质量的研究中,有的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16],有的研究则表明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17]。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两者的关系受到某一变量的调节。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如组织支持[18]、同事支持[19]可以缓解家庭、工作间的角色冲突。另一项针对老年人的调查显示,不论是提供情感支持或者物质支持,配偶支持水平越高,老人的婚姻满意度就越高[20]。那么配偶支持是否能够缓解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母亲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呢?

综上所述,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包含调节和中介作用的模型,如图1所示。在当前文化背景下,研究工作母亲的家庭-工作冲突对其婚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为匹配假说提供研究证据,同时也为全面二胎政策背景下如何协调工作母亲的家庭、工作关系提供依据。



法

1.1 被试

方

1

被试为来自中部某省四个城市的498名工作母亲,其年龄在25-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岁。日平均工作时间为8.08小时,与孩子相处时间平均为4.36小时。其中,76.7%的被试育有1个孩子,21.3%的被试育有2个孩子,2%的被试育有3个孩子。共发放问卷498份,回收有效问卷467份。

1.2 工具

- 1.2.1 育儿压力问卷 采用由耿岚等人[21]组织修订的养育压力量表简缩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 PSI-SF)中文版中的育儿愁苦(Parenting Distress)维度,共12个条目。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5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的压力越大。本次测量的Cronbach'α系数为0.852。
- 1.2.2 家庭-工作冲突问卷 采用 Neterneyer 和 Boles 编制的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文修订版中的家庭-工作冲突维度^[22]。该维度包含5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次测量的 Cronbach'α系数为0.877。
- 1.2.3 婚姻满意度问卷 采用Olson 1981年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的婚姻满意度维度[^[23],该维度共10个条目,评分高表示婚姻满意度高,反之表示满意度低。采用Likert 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次测量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4。
- 1.2.4 配偶支持问卷 根据 Dehle 2001 年编制的 亲密关系支持评价量表(the Support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Rating Scale, SIRRS)中情感支持维度修订 而成,通过询问"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困境时,我的配偶会……"来评价配偶提供的情感支持水平^[24],包含8个条目,采 Likert 5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几乎 总是。本次测量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17。

1.3 统计处理

利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考察共同方法偏差[25]。结果发现,研究中共有1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39%,小于40%的临界值。可见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显著。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育儿压力与婚姻满意度、配偶支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家庭-工作冲突成显著正相关。配偶支持与家庭-工作冲突存在显著但略微弱的负相关。婚姻满意度与家庭-工作冲突存在显著负相关,与配偶支持成显著正相关。

2.3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 Hayes 2013 年^[26]开发的 SPSS 宏进行检验,将 Bootstrap 再抽样设定为 2000,结果表明(如表 2 所示):家庭-工作冲突显著正向预测育儿压力(β = 0.52,P<0.001);育儿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β =-0.28,P<0.001),家庭-工作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β =-0.14, β =-0.15(β =-0.15(β =-0.21,-0.08; β =-0.05)。将配偶支持的交互项对婚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15(β =-0.21,-0.08; β =-0.05)。将配偶支持加+1SD的被试作为高支持组,M-1SD的被试作为低支持组,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配偶支持水平的升高,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逐渐减弱(由 β =-0.36, β =-0.0001减弱为 β =-0.20, β =0.0001)。

表 1	各变量的	的平均数、方差.	及相关系	系数(N=467)
					_

	M	SD	1育儿压力	2婚姻满意度	3家庭-工作冲突	4配偶支持		
1	28.57	8.44	_					
2	36.69	6.7	-0.45**	-				
3	10.14	4.35	0.52**	-0.33**	-			
4	26.83	6.44	-0.22**	0.49**	-0.11*	_		

表2 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育儿压力的中介作用,配偶支持的调节作用)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P
育儿压力	家庭-工作冲突	0.52	0.27	173.97***	0.52	0.44	0.60	13.19	0.00
婚姻满意度	家庭-工作冲突	0.62	0.38	71.51***	-0.14	-0.22	-0.06	-3.25	0.00
	育儿压力				-0.28	-0.37	-0.19	-6.39	0.00
	配偶支持				0.42	0.35	0.49	11.2	0.00
	家庭-工作冲突×配偶支持				0.07	0.00	0.13	2.03	0.04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人回归方程,*P<0.05,**P<0.01,***P<0.001

3 讨 论

以往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27],本研究从另一个维度切入,表明家庭-工作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这一结果既与理论假设一致,也符合社会现实。匹配假设(Matching-Hypothesis)认为家庭-工作冲突会对与家庭相关的变量产生更大影响^[7],本研究发现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匹配假设。现实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存在,女性往往承担较多的家务,故而也承受着更大的角色冲突。正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工作-家庭冲突还是家庭-工作冲突,都会降低婚姻满意度^[28]。

本研究发现, 育儿压力在家庭-工作冲突与婚

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结果说明,家庭-工作冲突越高的工作母亲,其育儿压力越高,体验到的婚姻满意度会越低。这可以从前人研究与生活实际两方面来解释。首先,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一方面,Aryee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工作冲突与育儿压力相关[29]。早前研究多对工作-家庭冲突与育儿压力的关系进行探讨[12],但较少有研究调查家庭-工作冲突对育儿压力的影响。本研究表明家庭-工作冲突对育儿压力有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育儿压力可以负向预测婚姻满意度与婚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变量提供了支持。其次,现实生活中家庭-工作冲突水平高,会使工作母亲处于分身乏术的境地。工作中的投入直接导致了其分配在家庭中的精力减少,可能会遇到孩子生病

无法陪伴、家长会无法参加等情况,从而增大育儿压力。家庭-工作冲突可能会以育儿压力为爆发点,进一步影响婚姻满意度。事实上,生活中由于不能平衡家庭-工作冲突而放弃事业或者婚姻的女性并不少见,随着"二胎时代"的来临,这一现象可能更加突出。

已有研究发现配偶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31]。本研究则发现,在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配偶支持也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在家庭-工作冲突水平相同的情况下,那些感受到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更多的工作母亲,其婚姻满意度水平也更高。现实生活中,若工作母亲从配偶处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关怀,那么其情感得到满足,精神压力也会相应的减小。配偶承担一定的家务以及照顾孩子的责任,有利于减小工作母亲的角色压力,缓解其家庭、工作间的冲突,提高婚姻满意度。因此,要缓解工作母亲由于家庭-工作冲突为职业发展、婚姻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其配偶分担育儿压力、提供情感支持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在全面二胎政策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 李苏蓉, 陈萍, 刘鹏,等. 监狱警察从工作中的心理脱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1): 142-146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中国妇运, 2015, 11: 16-24
- 3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6:5-15
- 4 杨竞, 朱雅荣. 职业,学历,年龄与婚姻——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陕西人口婚姻分析. 中国统计, 2014, 11: 16-17
- 5 连东琴, 史慧颖, 范玲霞. 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述评. Advances in Psychology, 2014, 4(2): 338-343
- 6 Sieber SD. Toward a theory of role accu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39(4): 567-578
- 7 Goode WJ. A Theory of Role Str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4): 483–496
- 8 Moore JE. Why is this happening? A causal attribution approach to work exhaustion conseque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2): 335–349
- 9 郑颖娴, 肖佳莹, 李晓敏, 等. 新婚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6): 1070-1074
- 10 Lavee Y, Sharlin S, Katz R.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ress on

- marital quality: An integrated mother-father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6, 17(1): 114-135
- 11 Krieg DB. Does motherhood get easier the second-time around? Examining parenting stress and marital quality among mothers having their first or second child.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7, 7(2): 149-175
- 12 Shreffler KM, Meadows MP, Davis KD. Firefighting and fathering: Work-family conflict, parenting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ing and child behavior. Fathering, 2011, 9 (2): 169-188
- 13 Boyar SL, Jr CPM, Jr DCM, et al. The impact of work/family demand on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8, 23(3): 215–235
- 14 Lee Siew Kim J, Seow Ling C. Work-family conflict of women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 Women in Management Review, 2001, 16(5): 204–221
- 15 Caplan G.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Lectures on concept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4, 5(2): 577-579
- 16 Fellows KJ, Chiu HY, Hill EJ, et al.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couple relationship quality:a meta-analytic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016, 37(4): 509-518
- 17 Perrone KM, Worthington EL. Factors influencing ratings of marital quality by individuals within dual-career marriages: A conceptual mod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1, 48(1): 3-9
- 18 Bhave DP, Kramer A, Glomb TM. Work-family conflict in work group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upport, and demographic dissimilar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1): 145–158
- 19 Wang M, Liu S, Zhan Y, et al. Daily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alcohol use: testing the cross-level moderation effects of peer drinking norms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2): 377-386
- 20 王大华, 张明妍. 老年人配偶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夫妻依恋,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2): 195-201
- 21 耿岚, 柯晓燕, 薛晴, 等. 婴儿母亲育儿压力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2008, 27(6): 457-459
- 22 DailL. Fields 著. 阳志平, 王薇, 王东升, 宋珉, 译. 时勘审校. 工作评价:组织诊断与研究实用量表.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188-199
- 23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增订版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杂志社, 1999. 156-159
- 24 Crystal Dehle, Debra Larsen, John E. Landers. Social Support in Marriag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1, 29(4): 307–324
- 25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下转第955页)

- bbing via smartphon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3: 9–18
- 4 代艳丽, 奉苏妹.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大学生"低头族"的启示. 学术探索. 2016. 1: 48-52
- 5 Do TMT, Gatica-Perez D. Human interaction discovery in smartphone proximity networks. Personal & Ubiquitous Computing, 2013, 17(3): 413-431
- 6 Blackman KCA, Zoellner J, Kadir A, et al. Examining the feasibility of smartphone game applications for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ames for Health Journal, 2015, 4(5): 409-419
- 7 Karadag E, Erzen E, Duru P, et al. Determinants of phubbing, which is the sum of many virtual addiction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2015, 4 (2): 60-74
- 8 刘勤学, 杨燕, 林悦, 等. 智能手机成瘾: 概念、测量及影响 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1): 82-87
- 9 Roberts JA, David ME. Put down your phone and listen to me: How boss phubbing undermine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mployee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75: 206–217
- 10 Grusec J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family: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1, 62(1): 243–269
- 11 Richins ML, Chaplin LN. Material parenting: How the use of goods in parenting fosters materialism in the next gener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5, 41(6): 1333-1357
- 12 马月, 刘莉, 王欣欣, 等. 焦虑的代际传递: 父母拒绝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23-27
- 13 柳娜, 陈琛, 曹玉萍, 等. 家庭暴力严重躯体施暴行为的代

- 际传递——目睹家庭暴力.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1): 84-87
- 14 邢晓沛, 张燕翎, 王美芳. 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体罚态度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6): 827-829
- 15 刘庆奇,周宗奎,牛更枫,等. 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中介与调节作用分析. 心理学报, 2017, 49(12): 1524-1536
- 16 惠秋平, 石伟, 何安明. 中学生大五人格特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手机成瘾倾向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使用动机的调节作用.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7, 1: 92-96
- 17 Grusec JE. Soci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power assertion. Human Development, 2012, 55(2): 52–56
- 18 Hong FY, Chiu SI, Huang DH.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aiwanese university femal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6): 2152–2159
- 19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 20 Roberts JA, Pullig C, Manolis C. I need my smartphone: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cell-phone addi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5, 79: 13–19
- 21 Koo HY. Cell phone addiction in highschool students and its predictors. 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Child Health Nursing, 2010, 16(3): 203–210
- 22 Yen JY, Yen CF, Chen CC, et al. Family 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use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adolesc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7, 10(3): 323–329

(收稿日期:2018-01-28)

(上接第1005页)

- 26 Hayes A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013, 51(3): 335–337
- 27 Minnotte KL, Minnotte MC, Bonstrom J. Work-family conflict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US workers: Does stress amplification matter?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015, 36(1): 21–33
- 28 陈怡, 方晓义, 兰菁, 等.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2): 308-311
- 29 Aryee S, Luk V, Fields D. A cross-cultural test of a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 25 (4): 491-511
- 30 Lavee, Yoav, Sharlin, et al.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ress on marital quality: An integrated mother – father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6, 17(1): 114–135
- 31 陈羿君. 男性志愿役军官工作-家庭冲突与婚姻满意度关系之研究: 以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项. 台湾: 树德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收稿日期:2017-12-29)